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5.6004

# 《陌上桑》知识翻译探赜

李正栓，田雅

（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陌上桑》中蕴含的官职、服饰与农业等词汇，共同构建了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与社会背景的知识体系。傅汉思与宇文所安的译文因其深厚的西方文学功底，在可读性方面表现出色，对原诗表层知识的传达较为准确，不过在部分深层文化内涵的把握上有提高的空间；杨戴夫妇与李正栓的译文因其对本土文化的深刻理解，对原诗的深层意义呈现和知识再生产更为精准。以知识翻译学的中和翻译观衡量，中国译者的翻译更契合中和翻译标准，能够更好地实现文化内涵与语言表达的平衡。

**关键词：**《陌上桑》；知识翻译学；中和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5)06-0026-08

## 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in “Mo Shang Sang”

LI Zhengshuan, TIAN Y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 The poem “Mo Shang Sang” incorporates a range of terms related to official positions, clothing and agriculture, collectively constructing a knowledge system with distinct historical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With a profound background in Western literature, Hans H. Frankel and Stephen Owen produced translations which excel in readability and demonstrate high accuracy in conveying the surface-level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text. However, there remains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capturing some of its deeper cultural connotations.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on the one hand, and Li Zhengshuan on the other, by virtue of their deep understanding of native culture, each present a more precise reproduction of the poem’s underlying meaning and reconstruction of its cultural knowled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alanced-harmonious Translation in Transknowletology, the translations by Chinese translators adhere more closely to its standards, thereby achieving a superior balance between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linguistic expression.

**Keywords:** “Mo Shang Sang”; Transknowletology; Balanced-harmonious Translation

乐府诗涵括了大量以女性为中心的叙事诗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女性形象谱系，比如《上邪》中直率表白的女性形象、《孔雀东南飞》中为爱

抗争的女性形象、《有所思》中果断决绝的女性形象以及《陌上桑》中不畏权贵的女性形象等。《陌上桑》一诗塑造了外貌美丽、内心坚贞、勤

收稿日期：2025-08-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文学批评小史”（22WZWB018）；译国译民翻译研究院新时代翻译与翻译行业基金项目“人工智能背景下翻译人才培养体系构建”（Y202303）

作者简介：李正栓，男，河北石家庄人，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典籍英译、文学翻译、英语教学。

劳善良又机智聪慧的女性形象——秦罗敷。该诗在艺术手法使用、人物形象构建、叙述结构搭建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堪称乐府诗发展中的里程碑。当前,学界关于该诗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中文文本的分析上,如人物形象分析、主题和意象解读等,而对相关英译研究较少。事实上,英译比较研究有利于推动该诗的再解读,助力乐府诗英译传播。

翻译是不同语言承载的不同知识的选择、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在本质上属于一种知识建构<sup>[1]</sup>。知识翻译学一方面将原文看成知识的集合体,另一方面将翻译看成以知识为中心的实践活动<sup>[2]</sup>,其强调译文的知识性和译者的实践性,认为“人与知识共同演绎知识翻译学的本体论关系”<sup>[3]</sup>。知识偏向客观,实践偏向主观,任何翻译的过程都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知识翻译学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将知识和实践这两个主客观因素结合起来研究翻译文本。研究译文的知识构建和译者的实践活动,能够较全面地进行知识翻译批评。

“从本质上讲,任何知识的本初都是地方性知识。”<sup>[4]</sup>《陌上桑》中包含大量地方性知识,外国译者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傅汉思(Hans H·Frankel, 1916—2003)、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1946—)、伯德(Charles Budd, 1795—

1884)等,中国译者许渊冲(1921—2021)、杨宪益(1915—2009)和戴乃迭(1919—1999)夫妇、汪榕培(1942—2017)、李正栓(1963—)等都翻译过该诗。下文以美国译者傅汉思、宇文所安和中国译者杨戴夫妇、李正栓的《陌上桑》英译文为研究对象,采用对比视角,分析译文中地方性知识的再建构,并探究译者身份和时代背景对知识翻译的影响。

## 一、地方性知识的翻译

知识首先是地方性的,经过翻译和传播方能成为世界性知识。“翻译作为一门艺术,会因为译者的理解不同、表述不同,而呈现另样的译文。”<sup>[5]</sup>在翻译具体地方性知识时,中外译者呈现出不同的翻译特点,在词汇理解、词汇选择、知识呈现上表现出不同特征。

### (一) 汉代官职知识认知与传译

《陌上桑》中包含大量汉代官职名,如“使君”“太守”“小吏”等。这些官职属于文化负载词,反映了汉代的官职文化,是中国化、时代化、地方化的产物。它们在英语文化中并无对应词,因此译者的认知与选择决定了知识的传译方式,也会影响读者的接受。四位译者对《陌上桑》中官职名的翻译如表1所示。

表1 《陌上桑》中官职名英译

官职名	傅汉思	宇文所安	杨戴夫妇	李正栓
使君	the prefect	the lord governor	lording	a prefect
府小吏	county clerk	county runner	prefecture minutes	a clerk
朝大夫	provincial court councilor	a great lord at court	a scribe	a senior state official
侍中郎	palace attendant	the Emperor's entourage	a minister	a courtman
专城居	lord governor	the master of a city	governs a district	a prefect

“使君”是汉代对太守、刺史等州郡县长官的尊称。在《陌上桑》中,这位“使君”是作为罗敷丈夫的对照和反面出现的。他位高权重,但行为轻浮,与罗敷丈夫形成对比。傅译文和李译文的“prefect”指负责城市、军队或财政的高级行政长官,该词源自古罗马的官职。两位译者采用了功能对等的翻译法,采用西方读者熟悉的用词。宇文所安用词在英语中对应总督、州长,其中“lord”是敬语,增加其尊贵感,弱化了“使君”的负面形象。“lording”为动词,杨戴夫妇进行了大胆的移用;该词带有强烈的贬义,生动地刻画出这位“使

君”仗势欺人、傲慢无礼的嘴脸,在四种翻译中感情色彩最强。

《现代汉语词典》中“吏”指的是“旧时没有品级的小公务人员”<sup>[6]</sup>。《史记·李斯列传》中有“年少时,为郡小吏”。本诗中“府”旧指官府或达官贵人的住宅,这里理解为官府。傅汉思和李正栓都选择“clerk”一词来翻译“小吏”,表示政府机关中负责行政职责的官员,地位较低,与原诗表意相同,翻译得当。但傅汉思同时选择的“county”却无法与“府”相对应。宇文所安译为“runner”,可以理解为公司中跑腿的人或部队

中的传令兵，与原文语境差异较大。杨戴夫妇译为“prefecture minutes”，可以理解为市政府办公室的会议记录员，属于造词。“造译是创造新词的过程。中国人在将外语译成中文时往往胆大包天，而在将中文译成外语时却总是过于谨慎。”<sup>[7]</sup>事实上，造词现象一直存在，时代的发展需要新词来表达，因此在对外翻译时，适当的造译是必要的。

“朝大夫”指的是朝廷中的文官，傅汉思将“朝大夫”译为“provincial court councilor”，省级法院顾问，职业领域跨度较大。宇文所安的翻译比较好理解，且较为准确，是以归化的方式在译入语中找到对应词。杨戴夫妇译文的抄写员对应皇宫中的书吏，符合“朝大夫”文官的特质，是杨戴夫妇基于中国文学知识所做的选择，但就本诗而言，难以体现官职晋升的原义。李译文选择“senior”一词是为了反映官职升迁。

“侍中郎”属于郎官。郎官这一官职属类源自战国，包括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官员，是侍奉君主的官职，东汉后其地位更加重要，是皇帝身边的近臣。诗中“鹿卢剑”一词同样印证了这一点。鹿卢剑又名辘轳剑，代明先研究证明本诗中的“鹿卢剑”是玉具剑，即“剑首和剑柄等部分用玉石材料制成的剑”<sup>[8]</sup>。在汉代，郎官作为皇帝的近侍，一方面要保护天子安全，另一方面

出于皇家威严考虑，衣着比较讲究。傅译文和宇文译文对“侍中郎”一词的翻译均体现了郎官作为皇帝随从的性质，很好地呼应了原语境；杨戴夫妇译的“minister”和李正栓译的“courtman”都较模糊，不如两位外国译者达意。

“专城居”这一官职“历代都认为是太守”<sup>[9]</sup>，是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在本诗中，其旨在反映罗敷丈夫的晋升之路，展现其夫君的优秀。傅译文“lord governor”是具有贵族身份或被授予贵族头衔的总督，体现了叙述主体身份的尊贵和与君主的关系，实现了地方性知识之间的链接。宇文所安译文则太过笼统，没能准确再现原词含义。杨戴夫妇译文与傅译文相似。“使君”和“专城居”都是指地方长官，李译文都译为“prefect”，是为了再次强调罗敷丈夫的优秀。

就官职词翻译而言，中外译者在翻译时各有所长。中国译者在理解词义和把握全文核心主旨上相对更准确，外国译者在选词上更灵活多样。

## （二）农业文化知识辨识与迁移

《陌上桑》中蕴含许多农业知识，表征了中国古代社会生产方式。这些农业文化知识很难识别，也不容易迁移，是知识再生产的难点。译者对农业用词的翻译是否有助于全诗主题表达，亦是需要考察的重点。四位译者对《陌上桑》中农业用词的翻译如表2所示。

表2 《陌上桑》中农业用词英译

农业用词	傅汉思	宇文所安	杨戴夫妇	李正栓
陌上桑	Mulberries by the Path	Mulberry by the Path	By the Roadside Mulberry	On Roadside Mulberry
喜蚕桑	skilled with silkworms	likes to work with silkworms and mulberry leaves	the silkworms she tendeth	was good at picking mulberry
采桑	picks mulberry leaves	picks mulberry leaves	strippeth the mulberries	breed silkworms
耕者	the tillers	men at the plow	ploughman	ploughman
锄者	the hoers	men with the hoe	hoer	weed-hoers
犁	ploughs	the share	ploughing	ploughing
锄	hoes	hoe	hoeing	hoeing

中国是最早饲养绢丝昆虫的国家，先秦时代蚕桑产业已遍及黄河中下游。秦汉至盛唐蚕桑业更为兴盛，丝织品十分精美，其生产重心始终在黄河流域。《陌上桑》题目中的“桑”四位译者都译为“mulberry”，傅汉思译为复数，展现的是路旁一片桑树的景象。宇文所安、杨戴夫妇和李正栓都将其译为单数，表示种类。宇文所安和傅汉思都将“桑”置于画面中心、“陌上”作为背景。

杨戴译文和李译文则将“陌上桑”作为背景，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场所，一方面与正文内容自然连接，另一方面能引起读者阅读兴趣。“喜蚕桑”中的“喜”字，有的版本写作“善”，即擅长。宇文所安译为“like”，作“喜”字讲，傅译文和李译文都是作“善”之意。杨戴夫妇译文的“tendeth”是古英语，属引申用法，意思是照料，也说得过去。“采桑”应当是采桑叶喂蚕，因此傅译文、宇文

译文译为“mulberry leaves”更为贴切。杨戴夫妇再次使用古旧词“strippeth”，可能希望通过古旧词营造文言文的语言形态。李译文则采取逻辑显化处理，对原文进行引申，“采桑”的目的是养蚕，这让目的语读者更容易理解，但照字面直译或许更好。尽管历史上英美曾尝试养蚕，但现代养蚕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因此西方读者对蚕桑业并不熟悉，李正栓力求通过这种翻译降低理解难度。“耕者”“锄者”是基于中国农耕文化和农业用具的固有角色，几位译者中，傅汉思、杨戴夫妇和李正栓的处理更为凝练。“犁”和“锄”两位外国译者都译为农业用具，杨戴夫妇和李正栓则译为农业活动，“耕者”和“锄者”并非因为看罗敷而忘拿东西，而是因为太入迷而忘记了自己所做

之事，因此译为农业活动更佳。

杨戴夫妇译文和李正栓译文显示了国内译者对中国农业的熟悉，中国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更到位，英语表达更贴切。此外，杨戴夫妇为了还原古体诗的特性，采用部分古旧英语词力图达到古言古语的效果。傅汉思和宇文所安的译文对部分地方的理解有偏差，对于词语在诗中的深层用意把握不够准确。

### (三) 服饰文化知识解读与表达

服饰词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地方性知识的代表。《陌上桑》一诗在描写罗敷外貌时，使用了大量的服饰、妆发词，例如“堕马髻”“下裙”“上襦”等。四位译者对《陌上桑》中服饰用词的翻译如表3所示。

表3 《陌上桑》中服饰用词英译

服饰用词	傅汉思	宇文所安	杨戴夫妇	李正栓
倭堕髻	“falling” chignon	a trailing ponytail	hair neatly braided	her hair done in style
明月珠	“bright moon” pearls	bright moon pearls	pearl ear-rings like moon-beams	bright pearl
缃绮	yellow silk	saffron damask	silk...yellow	silk...light yellow
紫绮	purple silk	purple damask	purple	satin...purple
襦	jacket	vest	apron	jacket
裙	skirt	skirt	petticoat	skirt
帽头	headcloths	the headbands	salute	salute

“倭堕髻”这种女子发髻形式始于汉代。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桓帝元嘉中，京都妇女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sup>[10]</sup>堕马髻样式像从马上摔落之态，得其名。傅汉思译为“‘falling’ chignon”，虽未能体现“堕马”这一含义，但在发髻形式上已经完美对应。宇文所安译文为“a trailing ponytail”，虽与马相关，但让人想到的是马尾辫，与堕马髻并无关联。杨戴夫妇译文和李译文都采取省译的处理方式，倒也说明了问题。“缃绮”中的“缃”指浅黄色，

“绮”是古代对丝织品的称呼。傅译文、杨戴夫妇译文和李译文的用词相似，翻译简洁明了。宇文所安的用词更为考究，“saffron”是橙黄色，“damask”是锦缎。张连举认为罗敷是“大家闺秀”<sup>[11]</sup>。古代并非只有民间女子采桑，贵族女子亦可采桑。因此，罗敷有可能是贵族女子，那么穿“damask”“satin”这类华贵衣衫亦不无可能。襦裙出现在战国时期，兴于魏晋南北朝。襦，上衣；裙，下衣。汉代时，襦极短，只到腰间，而裙子很长，

下垂至地。傅译文和李译文将“襦”译为“jacket”，符合衣服特征。宇文所安译文“vest”，指无袖上衣，与“襦”的特点不大相同，文化理解有所偏差。杨戴夫妇对于“襦”和“裙”的选词并不能很好地体现原服饰的特点，出现了偏差。“帽头”是古代男子束发的头巾。原文中，“脱帽着帽头”表示对罗敷的尊敬及爱慕之意。傅译文和宇文所安译文都是直译。杨戴夫妇译文和李译文则基于此句的深层用意进行了转译。

通过对服饰知识翻译用词的分析可以发现，对于地方性知识浓厚的词，傅汉思、宇文所安倾向于从服饰特点或字面意上进行翻译，杨戴夫妇和李正栓则更多采取转译处理，旨在突出主题，方便读者理解。在异化与归化、直译与意义之间，中外译者都适时调整，进行了融通与调和。

## 二、译者与知识翻译实践

知识翻译学认为，“知识是关于人的物学，是一种以物为话语实践进行的人的语言叙事”<sup>[12]</sup>。

知识的传播必然以人为媒介，并体现人的意志。作为一种兼具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存在，知识既是实体的，也是过程性和实践性的，其本质具有鲜明的意图性，始终服务于特定目的。因此，探讨知识翻译的过程，必须回归译者这一核心主体，考察其身份、学术经历对知识积累的促进作用，研究社会背景对翻译思想的塑造如何影响译者的知识翻译实践。

### （一）译者身份与知识积累

四位译者身份不同、所处时代不同、学术经历不同，多种因素共同促进了译者的知识积累，形成了独特的知识翻译过程。

傅汉思生于德国柏林，是德裔美籍犹太人，早年专攻西班牙语文学，二战期间转向汉语学习。1948年，他结识了中国文学家沈从文，并在其引荐下与苏州才女张充和（1914—2015）相识。傅汉思深厚的汉学积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妻子张充和的熏染。张充和出身教育世家，工诗词、善书法、精昆曲，被誉为“民国最后一位才女”。1949年，傅汉思与张充和成婚后移居美国，其学术重心逐渐从西班牙文学研究转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1961年，他受聘于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研究领域由唐诗拓展至汉魏乐府诗。其汉学成就与张充和的学术支持密不可分。据考证，“张充和曾以楷、行、隶等多种书体为傅汉思的10部著作题写汉字正文、尾注、古诗原文及中文书名”<sup>[13]</sup>。管宇指出，傅汉思在张充和的熏陶与协助下投身中国文学译研的道路，并最终在其影响下成为古诗翻译与研究领域的权威<sup>[14]</sup>。这一学术伉俪的合作，不仅成就了傅汉思的汉学事业，也开辟了其乐府诗研究的独特路径。

傅汉思是研究型译者，其翻译实践始终以严谨的学术研究为基础。他有宽广的比较文学视野，在汉魏乐府诗研究中既能聚焦文本内部的异质性、思想表达与叙事方式的独特性，又能揭示跨文化的“同构性”。这种双重视角使其译文在保持学术忠实性的同时，兼具比较诗学的阐释深度。《陌上桑》本身融合了民间歌谣的质朴与文人诗的铺陈，傅汉思精准把握住了这一点。在夸赞罗敷美貌时，采用“The tillers forget their ploughs”“Just because they've looked at Lo-fu”等口语风格强烈的表达，而描写罗敷夸夫时，则采用更为庄重的用

词如“county clerk”“ourt councilor”和排比句式如“At fifteen...At twenty...At thirty...At forty...”，以展现乐府诗的不同叙事方式，展现了文学的异质特征。

宇文所安是美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长期担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专攻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其学术谱系可追溯至耶鲁大学汉学传统。作为傅汉思的弟子，他继承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同时拓展了中国古典诗学的阐释维度。宇文所安与中国文学的渊源始于少年时期。他14岁偶然接触到英译中国诗集，被中国诗歌的审美体系与哲学深度所震撼，自称“为唐诗而生的美国人”。这一早期经验不仅塑造了其学术志趣，更预示了他日后研究“学者-译者”的双重身份。宇文所安的学习生涯和职业生涯一直聚焦中国诗歌。他在耶鲁大学系统研习中国语言文学，1972年获博士学位，论文《孟郊与韩愈的诗》（*The Poetry of Meng Chiao and Han Yu*）展现出他对中古诗歌形式演变的敏锐洞察。此后，他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与哈佛大学，其研究范围纵贯先秦至清代，横跨诗歌史、文论史与手抄本文化研究。这些经历构成了宇文所安从事翻译的知识基础，使其翻译兼具研究特质。

作为研究型译者，宇文所安的翻译实践具有鲜明的学术特征。首先，他注重文本考据与历史语境还原，其译注常结合版本校勘与历史语言学分析。在*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_Beginnings to 1911*一书中，宇文所安以时间为序，按照时代特点、体裁特点和主题特点对先秦至1911年的中国诗歌进行了介绍。相比其他选集类译本，宇文所安译本中的介绍性文字更多，充分体现了其调查研究之广泛。其次，他制定了完善的分层对应策略，如核心意象直译、文化负载词加注、韵律代偿等。在*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_Beginnings to 1911*一书中，宇文所安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其文化负载词翻译对应法，试图建立起完备的中国文化负载词翻译对应方案。他还在正文必要处添加少量的注释，以起到辅助理解的作用。

杨宪益中国传统知识与现代西学知识的基础都十分扎实。幼年时期，他在前清秀才魏汝舟的指导下系统研习传统蒙学，完成了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经典背诵训练，并掌握了古典诗词创

作技巧。严格的传统教育为其日后从事中国典籍翻译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中学阶段, 他就读于英国伦敦教会创办的新学书院 (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 在此过程中, 不仅英语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更通过广泛阅读莎士比亚、狄更斯等西方经典作家的作品, 培养了跨文化的文学鉴赏力。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言: “我一直认为从事文学翻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后来自己大半生都做了翻译工作, 这大概与我小时候就读翻译作品有关。”<sup>[15][330]</sup> 双语双文化的教育背景, 使其在翻译实践中能够游刃有余地穿梭于中西文化之间。相较于前两位译者, 杨宪益的知识涉猎更加广泛, 并非专注在某类体裁的中国文学。这也使得其后期的翻译呈现出百花齐放之貌, 其本人也被誉为“翻译了半个中国的人”。

杨宪益的妻子戴乃迭虽为英国人, 但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她 7 岁前一直跟随父亲在北京生活, 1937 年考入牛津大学后结识了杨宪益, 两人迅速相恋并结婚。受杨宪益影响, 戴乃迭将研究方向从法国文学转为中国文学, 为后来两人的合作翻译奠定了基础。杨宪益与戴乃迭的合作堪称 20 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上最具典范性的伉俪翻译模式。他们两人都兼具中国和外国文学文化背景, 且在翻译中保持着深度合作。他们的译文核心含义表达准确、语言流畅, 还能够根据不同体裁、风格调整诗的用词。在《陌上桑》译文中, 杨戴夫妇根据说话主体、说话场景的不同, 采用不同风格的词汇、句式进行翻译, 使全诗的故事叙事更加生动。如“Luofu, will’t please you / To enter my carriage?”一句深刻体现了使君的轻佻冒犯, “What nonsense you talk, sir!”一句展现了罗敷的果断勇敢,

“At thirty a minister; / Now, being forty, / He governs a district.”一句简洁凝练, 且口语性强, 突出了叙事诗的对话感, 同时使全诗风格轻松活泼。相较前两位译者, 杨戴夫妇译文选词风格更有特色。

李正栓的学术研究主要涵盖三个紧密关联的领域: 英美诗歌研究、英美诗歌汉译以及中国典籍英译。这一多维度的研究路径, 使其在诗歌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之间构建起独具特色的学术体系。作为一位长期致力于诗歌研习与教学的学者, 李正栓的翻译实践深深植根于其深厚的诗歌研究基础。他强调“充分的研究是开展翻译的基础”,

并在翻译过程中始终贯彻“研究先行”的理念。例如, 在《汉英对照乐府诗选》的前言中, 他以二十余页的篇幅系统梳理了中国乐府诗的发展历程、分类方式与艺术特点, 结合具体诗例展开分析, 并在最后部分专门回顾了乐府诗的英译历史, 体现出严谨的学术态度。在译文质量把控方面, 李正栓建立起一套独特的国际化学术协作机制。他积极借助跨国学术网络, 经常邀请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学者参与译稿审读。这一跨文化评议流程有效提升了译文的准确性与接受度, 形成了有别于其他译者的重要特色。

在《陌上桑》英译文中, 李正栓力求忠实再现原诗的叙事结构与情感基调, 希望通过韵律重构使译文符合英语诗歌的审美规范, 这种翻译策略是基于其对“文化适应性”的重视。例如“*She tied to the basket a green string, / And used cinnamon twigs for its handling*”“*With complexion clear and fair. / With fluffy hair combed with care*”等处对尾韵的还原, 再现了原诗的音韵美。“文化适应性”要求译文在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实现双重适应。中国诗歌向来重视韵律, 对押韵的翻译体现了中国诗歌的美学特征, 是对中国诗歌文化基因的翻译。他还重视对副文本的运用。“在内副文本方面, 译者可以选择事实性材料对原文中社会、历史、文化、文学、人物等方面的知识做补充说明, 以便读者理解。”<sup>[16]</sup> 在《汉英对照乐府诗选》中, 他通过提供乐府诗历史文化背景、分析诗歌艺术特征、梳理相关翻译传统、解释特定文化意象等方式, 尽可能地发挥副文本的阐释功能。全方位的副文本构建不仅有助于目标语读者深入理解乐府诗的文化内涵, 更在源语文本与目标语读者间架起了理解的桥梁。他认为, 严谨的学术研究与完善的副文本系统是典籍翻译质量的重要保障。

## (二) 翻译思想与知识生成

翻译作品中凝聚着译者的翻译思想, 译者的翻译思想决定了知识传播的种类和效果。

傅汉思的翻译思想可以概括为: 中间路线、近似翻译、再现层级、理性取舍。他在翻译时选择“介于字面直译与文学化意译之间的折中翻译方式”。这种定位既避免了过度归化导致的文化失真, 又防止了极端异化造成的阅读障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他对植物、动物等文化意象采取“近似的

“翻译”方式，即在保留原有意象的同时进行适度调适。其《陌上桑》英译中体现了这种文化负载词的分级翻译策略：直译优先、功能对等翻译次之、解释性意译次之、转译末之。他建立了系统的诗学要素再现层级：优先保留原诗的分行结构、词序排列等基础性特征，着力再现平行对偶和复沓等核心修辞手法，通过高度的文体意识来呈现不同诗体的特性。同时，译者十分重视句式对仗，在《陌上桑》英译中对其都进行了再现。对于不可译要素，他认为要理性取舍；对于原诗中的长度、韵脚、格律和声调等要素，他认为这些是“在英语中难以再现甚至是不可能表达的作诗的要素”<sup>[17]</sup>。因此在《陌上桑》英译中，译者并未尝试还原原诗的押韵及短促句式，而是聚焦内容的表达。这种基于语言现实的认识，体现了他对翻译限度的清醒认知。

傅汉思的翻译思想决定了其地方性知识的转换始终处于一定限度中。他坚持以可读性优先，因此不得不省略一些次要知识信息以降低读者的阅读困难。他重视中国诗学知识的翻译，因此在《陌上桑》译文中，对排比句式进行了保留，同时力求再现原诗的叙事方式和语言特点。

与傅汉思相似，宇文所安试图在目标语中建立一套详细的对应谱系，他试图在中国文化知识与英语文化知识中建立起一套中介文化知识谱系，以便实现知识传递。作为以英语为母语的汉学家，宇文所安主要采用归化翻译策略，这一选择建立在对目标读者认知图式的深刻把握之上。宇文所安受自身兴趣影响，根据自己在哈佛大学的课堂笔记整理出版了《中国文学选集》（*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这一知识生产体现了其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的有机统一。他的翻译基于译入视角，有选择地介绍美国读者喜闻乐见的内容。他在《中国文学选集》前言中明确阐述了其翻译原则：“注重忠实原文信息，力求呈现全面、翔实的文学质素，以期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参考价值。”<sup>[18]</sup>这种学术取向具体表现为以下实践特征：第一，在语言层面文化适应方面，避免使用古旧词汇，通过现代英语有效传达文言诗与现代诗的双重特质。第二，灵活运用英美两种英语变体，构建跨时代的诗歌语言体系。第三，进行诗学要素的创造性转换。宇文所安将“对仗”视为中国

诗歌的核心诗学单位，在翻译中采取多层次再现策略，通过在词汇层面保持意象对等、在句法层面再现平行结构、在修辞层面保留复沓效果等手段，提高译文质量。

杨宪益的翻译思想深受严复“信达雅”理论的影响，但其又有自己独特的时代诠释。他强调：“对原作的内容，不许增加或减少”<sup>[15][339]</sup>，这一表述体现了其对“信”（忠实）原则的严格恪守。然而，面对中西文化系统的根本性差异，杨宪益在实践中采取了辩证的翻译策略：采取归化取向的文化调适，在语言层面采用英语惯用表达，对文化专有项进行适度解释，在保持叙述流畅性的前提下处理文化障碍。例如，在《陌上桑》官职词翻译上主要采用意译和简化处理，以保证全文主要含义的流畅传达。王雯秋等研究发现，杨戴夫妇译文词汇重复率高，文中使用了一定量的生僻词和外来词，且口语风格较强<sup>[19]</sup>。

“翻译立场是译者在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协调过程中对原作重新创作时所持的一种态度和选择。”<sup>[20]</sup>李正栓希望站在文化传播者的立场上，努力为目标语读者提供更好的阅读感受。在翻译《陌上桑》时，他采取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法。他强调归化策略应以尽量不干扰译语读者为前提，其本质是通过适度降低文本陌生度，实现文化可理解性与审美流畅性的平衡，“以期降低译语中的陌生程度并产生熟悉化的感觉，从而为译语读者提供一种自然、切合、流畅的译文”<sup>[21]</sup>。他将归化方法细化为：意译（cultural paraphrase）、替换（cultural substitution）、增益（explication）、简化（simplification）。此外，他坚持韵体译诗，也灵活变通，能押韵时则押韵，不能押韵时不强求。在《陌上桑》英译中，译者并未采取全诗押韵，而是在适当之处，采取双行押韵或隔行押韵，以便在不影响全诗主旨传达的情况下适当还原原诗音韵美。

杨宪益和李正栓在翻译时重视读者接受、重视译文的忠实。他们也采用归化的方法，但与国外译者不同，他们不纠结于字对字或词对词的知识对应，而重在把握大局，对诗的主旨知识、形式知识、韵律知识等进行了多方面调试。

知识翻译学秉持真善美的“中和翻译观”，

基于中国传统哲学“中庸”思想, 强调翻译过程中知识传递的平衡性与调和性, 兼顾译出和译入双方, 寻求和谐统一, 强调适度、调和与平衡。知识翻译学从中国译论和文化中创造属于中国文学的翻译批评范式。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 中国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更准确, 倾向于以词汇深层含义为主来选词; 外国译者在选词上更多样, 语言流畅, 但对原文的理解不如中国译者精准, 偶尔会采用字面直译方式, 导致译文不够精准、不得要领, 部分地方性知识不能很好地转换。此外, 中国译者在进行诗歌翻译时, 对于“美”的还原是外国译者远不能及的。杨戴译文和李译文都体现了对诗歌形式美和韵律美的高度重视。

中国译者在翻译时更重视“真善美”的平衡, 注重“度”的把握。一味求“真”容易让诗失掉原本的韵味, 因此中和翻译显得尤为重要。如此方能适度传播中国文化知识, 同时将中国诗歌的美展现给读者, 且避免给读者带来过多阅读障碍。杨戴夫妇译文的省译更多一些, 李译文注重整体含义的翻译及形式和音韵类知识的转换, 这也印证了中和翻译的重要性。

“文学翻译要想带给读者审美享受, 就必须有语言美学手段的介入”<sup>[22]</sup>, 且“中国诗歌在诗性、诗情、诗风等诗学的总体审美上与西方诗歌理念迥异”<sup>[23]</sup>, 对这些独具中国风味的知识进行翻译甚至比文本型知识翻译更为重要。“文学翻译不仅仅是语汇、语法、语体的对接, 还是心灵通道的对接、灵魂剖面的对接、审美体验的对接”<sup>[24]</sup>, 以真求知、以善立意、以美行文每一方面都同样重要。总体而言, 中国译者无论在求真、求善还是求美方面都比外国译者表现得更好。“中国经典由谁译”这一议题, 学界争论已久。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 由中国译者来肩负此项翻译重任, 不仅至关重要, 而且十分必要。

## 参考文献:

- [1] 严程极, 杨枫. 知识翻译学的知识渊源 [J]. 上海翻译, 2022(6): 39.
- [2] 杜世洪, 施金宏. 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翻译过程的描述知识与知识描述 [J]. 当代外语研究, 2025(1): 113.
- [3] 杨枫. 知识翻译学论纲 [J]. 当代外语研究, 2023(4): 1.
- [4] 徐玉凤. 知识翻译学视域下《齐民要术》的数字英译 [J]. 当代外语研究, 2023(6): 50.
- [5] 王克非. 关于翻译的几组概念 [J]. 外语导刊, 2024, 47(1): 102.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 [M]. 7 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804.
- [7] 潘文国. 典籍翻译的下一步 [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4, 46(4): 11.
- [8] 代明先.“鹿卢剑”所见《陌上桑》中罗敷丈夫的官职 [J]. 科教文汇 (上旬刊), 2011(16): 71.
- [9] 王青. 从汉魏舆服官制的变化看《陌上桑》的创作年代 [J]. 文学遗产, 2007(2): 117-118.
- [10] 后汉书: 二十六史 [M]. 尹小林, 校注. 北京: 大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22: 1278.
- [11] 张连举. 《陌上桑》中的罗敷形象新说 [J].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 2001(2): 115.
- [12] 杨枫. 知识是物学, 翻译是人学 [J]. 当代外语研究, 2025(1): 1.
- [13] 管宇. 汉学伉俪傅汉思与张充和 [N]. 中华读书报, 2023-04-05(19).
- [14] 管宇. 傅汉思中国古诗英译研究 [D].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2: 30.
- [15] 杨宪益. 杨戴夫妇自传 [M]. 薛鸿时, 译.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0.
- [16] 王树槐.“翻译副文本研究”专题 [J]. 山东外语教学, 2024, 45(5): 105.
- [17] 傅汉思. 梅花与官闱佳丽: 中国诗选译随谈 [M]. 王蓓,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前言.
- [18] 冯正斌, 赵慧. 社会翻译学视域下杜甫诗歌典故英译对比研究: 以许渊冲与宇文所安为考察中心 [J]. 外国语文研究 (辑刊), 2024(1): 255.
- [19] 王雯秋, 马广惠. 杨宪益与戴乃迭《儒林外史》英译本的翻译风格研究 [J]. 外国语文, 2020, 36(4): 103.
- [20] 王昌芹, 安丰存. 中国文化“译出”路径下翻译立场的阐释 [J]. 外语学刊, 2025(1): 100.
- [21] 李正栓, 贾晓英. 归化也能高效地传递文化: 以乐府英译为例 [J]. 中国翻译, 2011, 32(4): 51.
- [22] 范梓锐, 于海玲. 美学取向: 翻译研究中一个古老而崭新的话题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4(1): 115.
- [23] 孟庆波. 西方汉学的中国诗歌翻译及研究: 以雷之波的《西文中国诗歌翻译及研究目录》为中心 [J]. 燕山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24(6): 38.
- [24] 林少华. 译海扬帆: 美是文学翻译的压舱石 [J]. 中华译学, 2024(1): 28.

责任编辑: 徐海燕